

## 書評

### 重構水上疆域的歷史 ——《水上疆域：1750—1880 年湄公河下游地區的商業 與華人》評介<sup>1</sup> 羅燦英<sup>2</sup>

《水上疆域：1750—1880 年湄公河下游地區的商業與華人》(以下簡稱《水上疆域》)一書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南亞史專家諾拉·庫克(Nola Cooke)和李塔娜(Li Tana)編輯出版。此書源于 1999 年李塔娜主持的一次專題研討會——“商貿越南：十九世紀的貿易和中國人”。實際上，此次研討會所涉及的區域超越現今越南南部所在地區，延伸到一個更廣闊的區域，包括北至柬埔寨、經湄公河三角洲和泰國灣、南至馬來半島的海岸地區和華南地區。嗣後，李塔娜和諾拉·庫克在如何定義這片廣闊區域的討論中逐步形成“水上疆域”(Water Frontier)的概念，並以此為名，選擇與此相關的會議論文及後續研究成果結集成書，於 2004 年正式出版。

該書正文部分除導論外分三大部分。導論由李塔娜執筆，概括詮釋了“水上疆域”的基本內涵。李塔娜以法國著名學者鄧尼斯·龍巴爾(Denys Lombard)的觀點開篇，引出該書的研究意圖，即重建南中國海共同體(水上疆域)的歷史，重點關注 18、19 世紀這一區域在商業上的整體性和重要性。其後，導論分別從“水上疆域——時代的大舞臺”、“人口流動與族群劃分的困難”、“經濟交換與市場”、“水上疆域與國家整合”四個方面概述 18 世紀到 19 世紀水上疆域的發展歷史，明確提出“人員、商品、思想的流動和交替構成了全書的中心議題”(p.2)。

第一部分以“可滲透的邊界”為標題，三位學者圍繞水上疆域的中國貿易和商人展開具體討論。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的綜述性論文強調 18 世紀晚期到 19 世紀初期東南亞的經濟擴張與中國的經濟增長緊密聯繫，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產品的需求成為生產、貿易以及航運的刺激因素。這篇文章再次論證了他多次表明的觀點——18 世紀中期到 19 世紀是東南亞充滿活力的商業拓展時代。錢江(James Kong Chin)對同一時期華南與阮朝之間舢板貿易情況的討論也印證了瑞德的論點，錢江還指出水上疆域發展的外部推動力來自華南地區，而這一時期可稱為東南亞的“中國世紀”。日本學者櫻井由躬雄(Yumio Sakurai)則詳盡論述了 18 世紀來自中國的開拓者在水上疆域早期形成及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力圖把這一區域描述成地理空間和歷史空間的結合體，這一共同體的內部人員共用著由相同歷史因素形成的類似歷史體驗。同時，他也指出王朝統治在這一地區薄弱而分散，這就使水上疆域獲得利於發展的政治環境，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人員和商品的自由流動。

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從不同角度討論了水上疆域的商貿流動，論證了“水上疆域”應被視為“一個經濟單元”(one economic unit, p.71)的觀點。李塔娜的兩篇文章重點討論以湄公河三角洲為中心、南接暹羅灣其他地點、北延至柬埔寨地區的區域貿易網路，並對 1750—1840 年間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船隻與造船業進行了細緻的個案分析。崔秉旭(Choi Byung Wook)一文探討了 19 世紀上半期阮朝對水上疆域上活動的中國人所採取的政策。Puangthong Rungswasdisab 的討論圍繞泰國與越南之間的衝突展開，重點揭示了 18 世紀 30、40 年代，兩國對水上疆域內陸腹地的貿易通道、

<sup>1</sup> *Water Frontier: 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 1750-1880*. Edited by Nola Cooke and Li Ta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此文首次发表于《海洋史研究》第一輯，2010 年，第 279-283 頁。

<sup>2</sup> 作者羅燦英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歷史學博士。

商業網絡以及資源財力進行爭奪的歷史過程，藉以探討商業擴張對於東南亞大陸新興政治力量競爭的影響。

該書的前兩部分著重研究作為一個整體區域的“水上疆域”，第三部分則探討水上疆域與外部世界的密切聯繫，強調水上疆域發展歷史的複雜性。諾拉·庫克(Nola Cooke)、卡爾·特羅基(Carl Trocki)兩位學者論證了水上疆域存在持久而有生命力的區域貿易網路，進而構建水上疆域、外部世界及其相互聯繫的立體圖景。諾拉·庫克(Nola Cooke)的文章還指出：在一些地區，水上疆域的河岸地區持續發展到19世紀晚期，顯示出與前一階段相似的特徵。卡爾·特羅基(Carl Trocki)則具體論述了更廣闊的水上疆域與西貢、新加坡、中國廣州和香港之間日益繁榮的殖民地貿易緊密聯繫的新形式。

要言之，該書從不同角度展示了複雜多面的水上疆域形成史：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從湄公河三角洲入海口到馬來半島的整個沿海地區，人員頻繁遷移、商品交換活躍、多元文化融匯、社會組織反復破壞與重建以及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在這一時期，“不同力量競相湧入水上疆域地區，並與各種本地力量聯繫、碰撞、融合後，再以一種不同的本土形式重新出現”。(p.5)

法國學者鄧尼斯·龍巴爾曾令人信服的論證指出，在過去的2000多年裏，華南地區和環南中國海地區由於世代的貿易網路、移民活動和文化交流而密不可分，構成了一個可以和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討論的地中海世界一樣的整體，割裂華南地區去談東南亞猶如想敘述地中海世界的歷史，卻避而不談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一樣。(p.2)這種立足於華南地方歷史，力圖將華南與環南中國海國家和地區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探討彼此之間貿易網路、移民活動和文化交流的新的研究視角，是近30年來國際學界最重要的研究趨勢之一，《水上疆域》一書無疑是其中較為引人矚目的成果之一。

《水上疆域》一書雖然只是一部論文集，但編者及作者力圖打破國別史的界限，將南中國海及其環海地區重新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研究，豐富並深化了鄧尼斯·龍巴爾有關華南地區與環南中國海地區構成類似地中海一樣的整體的創造性研究，對東南亞史研究的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邊界(Frontier)視角的引入以及“水上疆域”概念的界定。美國學者漢德培(Peter C. Perdue)曾經提出觀察中國與世界的邊界研究視角，並將“邊界”界定為一個關係性質的概念，同時，他指出美國和歐洲對於“邊界”一詞不同用法——一個作為地區(美國)，一個作為邊界線(歐洲)——雖然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國家形成路徑和對領土的不同認識，但是，它們都把邊界作為國家形成的必要前提。<sup>3</sup>《水上疆域》的編者李塔娜根據環湄公河三角洲地區河海交匯的特點，將這一地區界定為“水上疆域”，並專門述及水上疆域的興衰與東南亞的國家整合密不可分，可見，該書中出現的“Frontier”比較接近前一種用法，即“地區”。

新的研究視角的引入，旨在超越傳統的“民族—國別”研究視角。傳統研究視角往往是在國與國之間、不同族群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簡單地畫一條線，人為選擇地拼湊一些東西來代替複雜的文化整體。隨著東南亞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這種研究視角的缺陷，因此，拋開“民族—國別”史觀重新審視東南亞地區形成的獨特歷史，逐漸成為學界深化東南亞研究的共識和努力方向。而對於東南亞這樣一個多種類型文化並存的地區，研究者必須在動態變遷和創造性的交叉研究方面尋找新的視角和途徑。

《水上疆域》一書通過新的視角和手段，探究一段長期被忽視的東南亞發展的歷史事實，討論跨越國家政治、行政邊界的水上疆域活動平臺形成的歷史過程，進而指出，在水上疆域形成的歷史進程中，各個種族作為這一歷史進程的目睹者和參與者，其相應的歷史作用應得到適當的承認和重新評定。進一步考究而言，這些學者認為東南亞社會與國家的形成既不是某個單一因素的獨創，也不能簡單貼上單一的標籤，而是這一地區多種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sup>3</sup> [美]喬萬尼·阿裏吉、[日]濱下武志、[美]馬克·塞爾登主編，馬援譯：《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73—75頁。

其二，對於“誰是華人”這一問題的重新思考。自華人進入東南亞地區以來，華人逐漸成為這個地區的重要族群，東南亞研究也都承認華人在這一地區的重要歷史作用。然而，一旦身處於東南亞錯綜複雜的族群環境之中，研究者就會發現“誰是華人”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毋庸置疑，華人在種族、文化、宗教等方面具有某種共性，可是如果過分強調這一點，而忽視華人在不同地區、國家與個體背景差異下謀求解決生存、適應、同化與發展的多樣性，那麼對於“誰是華人”的回答就會流於表面化、籠統化。針對這種情況，李塔娜在導言中提醒研究者，“必須透過‘華人’這一族群概念的表面定義，把華人放到群體中考察，瞭解華人中不同的利益群體，這些群體的商業網絡和內在區別遠遠超過了族群甚至亞族群的劃分”（p.6）同時，除了華人族群內部需要加以細緻辨析外，華人族群外部也並不是想像中的對立關係，特別是在水上疆域政治、文化形成的過程中，華人直接參與其中，通過通婚或者進入當地社會上層等形式，逐漸形成區別於最初的華人族群的新族群。

由此引申而來的是這一時期的華人移民和商業網絡的問題。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其開創性的“朝貢體系”研究中，已經注意到東南亞地區與東亞是存在密切交往關係的區域，貿易和朝貢是這種交往的核心，其中貿易交往的重要媒介是華人移民及商業網絡。《水上疆域》一書則試圖從更廣的區域視角和更深的歷史視角重新審視“水上疆域”興起的歷史，更尋求“恢復南中國海沿岸地區的共同歷史和共同經驗”，（p.2）華人移民及其商業網絡正是這種共同歷史和共同經驗的承載主體和關聯媒介。該書與濱下武志的研究雖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二者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華人移民及其商業網絡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所得出的結論也是相互補充的，反映了這一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多重歷史脈絡。

此外，正文之後附有韋傑夫（Geoff Wade）關於 1810 年成書的《暹羅國路程集錄》的譯文。這部由阮朝初期官修的古籍，詳盡記載了東南亞地區 6 條陸上線路和航線的具體資訊，包括沿線港口、河口、海灣、島嶼以及東南亞大陸的居民等。韋傑夫從中選擇了自湄公河三角洲到馬來半島東海岸丁加奴（Terengganu）沿海航線的有關記載進行翻譯。《暹羅國路程集錄》是東南亞地區持續存在的富有生命力的區域網路的證據。編者將此譯文作為附錄，是想以此為例證，說明傳統研究視角所忽略的原始史料對於理解水上疆域的歷史極為重要，希望後繼研究者能對此加以重視和運用。

歷史並非個別事件的線性發展結果，《水上疆域》一書關注水上疆域的歷史發展過程，追尋其歷史脈絡的變遷，重視身處其中的不同利益群體的角色與作用，多角度、多層面地展示“水上疆域”的整體性和複雜性。或許每個研究者讀後會覺得該書提出的問題甚至超出它所想解答的問題，然而，正如導言最後所言，“這正是本書的價值，它並非發佈權威的論斷，而在於探求一種新的研究視角，鼓勵為分析歷史而提出的一系列新問題。”（p.12）